

浅议形象史学在日本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张建立*

内容提要：日本文化研究的境遇，往往因日本国力消长而忽冷忽热；关于日本民族人种的评价，也常常因日本国力兴衰而忽优忽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以及21世纪20年代末关于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三次集中讨论，也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日本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因国家、文化背景不同而异。跨学科、跨国比较研究等方法倡议由来已久，但具体落实尚有待细化。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和图像既是文化表现形态，又是历史生成和展演的一个方面。随着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发掘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的趋势。从日本学者的“绘画史料论”“风俗绘画的文化学”，到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形象史学理论，对于深化日本文化研究而言，可谓应运而生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

关键词：日本文化 绘画史料论 风俗绘画的文化学 形象史学 跨学科研究

在既有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中，无论是关于日本文化形态论，还是关于日本文化形成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直是比较通用的方法。而且，各类研究成果多是依据历史文献中的文字类材料，对日本文化进行静态性研究。毋庸赘言，历史文献不仅仅限于文字材料，还包含形象材料。所谓“形”，指用于分门别类的载体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等实物材料；所谓“象”，指依附于各类实物载体而存在的图像材料。

*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

历史上遗存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形象材料”，作为古人的文化财富与历史构成要件，是各个时代的社会风俗、文化礼仪、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信息载体。对日本文化做静态解析固然重要，通过援图入史、以图证史，将日本文化看成一个过程，把各类“形象材料”归位于其所产生的时代与空间，对日本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还原性重构，则不仅能增进对日本文化的精准认知，还有助于完善日本文化研究的历史学方法。

一 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现状与课题

日本文化研究的境遇，往往因日本国力消长而忽冷忽热；关于日本民族人种的评价，也常常因日本国力兴衰而忽优忽劣。当日本的国力不是很强大时，关于日本民族劣根性、日本文化劣等的言论就会相对多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森有礼就曾主张废除日语而改用英语为国语^①，甚至还出现了希望增加日本女性与西洋男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的论调^②。反之，当日本国力昌盛时，日本国民性特殊论、日本民族文化优秀论又会甚嚣尘上。^③ 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其演变进程也与日本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联。第一个时期是日本泡沫经济濒临破灭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二个时期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第三个时期是日本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于2010年被中国取代之后的21世纪20年代末期。

（一）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讨论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泡沫经济催生的日本国民性特殊论、日本民族文化优秀论仍大行其道的时期，很多学者受到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关于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实质上更倾

① 森有礼「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明六雜誌』第1号、1874年4月。

② 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石川半次郎出版人、1884年9月。

③ 张建立：《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第131~142页。

向于精准描述作为日本现代化独特推动力即所谓“日本型”文化的研究方法。

1986年8月29日至9月3日,由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主办,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学术振兴会及读卖新闻社等许多机关团体出资赞助的“日本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仙台召开。来自东亚各国的文化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服饰学、哲学、思想史、美术史、音乐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专业领域的学者,围绕日本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与东亚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本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提倡加强对日本文化开展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思辨性研究、实证性研究等。这些倡议成为其后学界讨论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时反复强调的内容,对于今天的日本文化研究亦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①

1987年,日本政府在京都正式设立了旨在网罗世界各国从事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的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88年3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首次日本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就是关于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的会议,即“世界中的日本——日本文化的解释及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这次参会的学者范围更广泛,分别来自美洲(美国等)、欧洲(英国、法国及波兰等)、亚洲(中国、泰国等)和大洋洲等不同地区。日本国内学者主要来自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科研机构。日本著名学者桑原武夫与会致辞,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纳·金、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梅原猛分别围绕世界中的日本文化这一主题做了演讲。其中,列维-斯特劳斯在演讲中指出:“在研究日本文化时,观察者本身必然属于某种文化,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研究者都无法逃避原有文化的影响。从这一观点出发,日本文化的研究只有通过各国研究人员的努力,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观察日本文化,才可望得到比较科学

^① 高增杰:《共同探讨日本文化 努力加深相互理解——出席“日本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讨论会”散记》,《日本问题》1986年第6期,第63~64页。

的结论。因此，日本文化研究必须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日本文化既然是一个复合体系，就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专业理论体系详细地加以考察，才可望得到比较全面的印象和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囿于某种既成学科的观点，往往只能见其一叶，而未能知其全貌，这就要求日本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广泛领域的研究活动。”^①也就是说，恰恰是欧美学者指出了打破既有西方学科限制而对日本文化开展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二）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讨论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引发了学界对昔日探讨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文化动力热潮的反思。1996年9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对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认真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经过较周密的学术准备，召开了“日本社会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围绕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关系、日本文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日本文明在未来东北亚格局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本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较深入的讨论。其中，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结合对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和许烺光《比较文明社会论》等日本文化论名著内容的分析，强调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日本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采用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只有比较日本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才能明确其特征。南开大学教授王家骅结合自己的著作《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的研究体会，强调了加强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离开个案研究，整体研究、抽象研究就有可能失之于空洞，或者与实际相脱离。在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中，个案研究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会其他学者在

^① 高增杰：《日本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出席“世界中的日本——日本文化的解释及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侧记》，《日本问题》1988年第4期，第60页。

发言中也对日本文化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予以首肯，在方法论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①

1996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学刊》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日本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学术座谈会。约 40 位专家学者及编辑人员出席了座谈会，特别是围绕日本文化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北京大学教授严绍盪指出，日本文化研究应提倡实证的研究方法，实证材料有文献和实物两种，文献实证要有文化氛围的精神。实证的观点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使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个别文化与世界互相联系的桥梁。因此，实证的观点和方法也包含最终上升到理论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指出，实证研究的确很重要，但作为研究方法，绝不能仅限于此，一定要有理论思维，一定要有很好的方法论，微观的研究一定要与宏观的考察结合起来。如果研究人员陷入实证研究，理论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只搞清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什么还不行，还必须搞清为什么，有何现实意义，有何价值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要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不断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江瑞平指出，在分析与综合两种研究方法上应强调综合，在实证和理论研究方面应强调理论研究。这四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人员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高增杰指出，随着国际形势和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研究正在从分科化研究向综合性研究转化，要扩大我们的视野，把日本放在东亚、亚洲甚至世界的整个文明中来看待，通过比较研究，综合地、立体地、全面地把握日本在发展道路上、社会结构上、民族精神上的特质。^②

① 文言：《日本文化研究需要迈上新台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研讨会”综述》，《日本学刊》1996 年第 6 期，第 150~151 页。

② 张义素：《“日本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学术座谈会纪要》，《日本学刊》1997 年第 2 期，第 155~156 页。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组织的关于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学术讨论会外，一些学者也刊发了相关文章。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刊发论文《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日本文化研究要注意“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崔世广指出，运用冻结、排除历史条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和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等研究日本文化是不充分的，因为其不仅不能客观和科学地说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非常期的日本文化状况，而且不能很好地说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差异等。“日本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发现日本文化的原理和逻辑。但是坦率地讲，无论中国还是国外的日本文化研究，至今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探究和发现日本文化的原理和逻辑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与历史的联系；只注意了对社会常态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非常态的研究。”只有按照历史的发展阶段把正常期与非常期的文化原理和逻辑都发掘出来，才是日本文化的全貌。我们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应该提倡和重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即用发展的眼光，把日本文化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来把握；既重视对历史常态的研究，也要重视对历史非常态的研究。这不仅对提高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水平，客观地说明日本文化的整体面貌十分重要，对展望日本文化的未来也是至关重要的。^①

（三）21世纪20年代末期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讨论

2010年日本第二大经济大国地位被中国所取代，从核心期刊发表的日本文化研究论文情况来看，中国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呈现出明显衰落的态势，日本文化研究由既往偏重于照搬日本经验的研究，变得更加理智和审慎，开始陆续出现以学科综述形式反思日本文化研究的文章。其中，既有对几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亦有对每一年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例如，中国社会科学

^① 崔世广：《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71~74页。

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在2011年中华日本学会召开的“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3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发言,2016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赵德宇发表论文《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等。单一年度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综述文章,如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王宝平的《2012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6期)、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王勇的《2013—2014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2期)、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江静的《2015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2期)、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吕顺长的《2016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1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韦立新的《2017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年第5期)、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小法的《2018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5期)。另外,《日本学刊》自2018年至2022年每年连续出版的《日本学刊》增刊以及自2023年出版的《日本年鉴》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対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几大领域进行年度学科综述。这些综述文章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及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问题,学者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能否创新研究方法逐渐成为制约日本文化学科建设与时俱进的瓶颈。

日本经济地位的衰落,令日本学界开始反思对自身文化研究的方法是否出了问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陆续在其机关杂志《日本研究》第53集(2016)、第55集(2017)、第57集(2018)上刊发专题文章,探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如何更为精准科学地研究日本文化。首先在2016年6月30日发行的《日本研究》第53集上刊发了主题为“失去的二十年——作为日本研究不可避免的课题”的专题文章。该专题从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的角度探讨了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期间的国际形势与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等,强调了要综合历史、文学、艺术、思想思潮、政治、经济等学科领域,将从世界看日本与从日本看日本结合起来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2017年5月17日发行的《日本

研究》第 55 集则围绕“日本研究的过去、现在、未来”主题，刊发了《〈日本文化〉的文化论与文化史：日本研究的推移》《日本文化论与神话、宗教史研究》《围绕作为人文学的日本研究断想》《国际日本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兼论作为机关的日文研的运营》《全球化视野下的日本研究重构：重新界定“日本”与“亚洲”》《日本大众文化研究的“昨日、今日、明日”》《“日本学”的对象与方法：面向未来的考察》《面向过去、现在、未来的项目计划：通过编纂辞典了解到的日本研究的特点》等论文，对日本文化研究特别是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思。学者意识到强化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18 年 3 月 30 日发行的《日本研究》第 57 集又以“日本研究的路标：必读的 100 册”为主题，围绕日本思想史、美术、宗教、文化人类学、日本文学、考古学、社会文化史、政治史、性别、大众文化、电影等领域的研究前沿动态与研究理论方法等进行了学科综述，推荐了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必读书目，旨在助力跨学科日本文化研究的开展，化解学者个人囿于学力无法快速推进跨学科研究的困境。

综上所述，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思辨性研究、实证性研究等倡议对今天的日本文化研究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是囿于学者个人学力等原因，在今天依旧没有能够很好地落实。其实，当前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不仅仅限于此，一些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也存在改善的余地。例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日本文化研究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历史文献不仅仅限于文字材料，还包含形象材料。但既有研究多偏向于运用文字材料对日本文化做静态解析，鲜见将日本文化看成一个过程，把各类“形象材料”归位于其所产生的时代与空间，对日本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还原性重构的研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因国家、文化背景而存在差异，因而具有多样性。跨学科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等方法倡议由来已久，但具体落实起来尚有待细化方案。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形象史学理论，对于深化日本文化研究而言，可谓应运而生的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

二 形象史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概述

形象史学,属于历史学中的文化史范畴,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提出的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中的“形象材料”重新建构的文化史阐释方法与展演方法。在具体研究中,需要兼备形象性思维与扎实的史学根基,打破既有学科界限,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共性与特殊性,融会图像学、新文化史等方法论与古史研究中的考据法,力求探赜表微,从多角度、多层面发掘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中所孕育或叠加的信息和价值,并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综合,避免从形象到形象或者从形象到文本的简单解读和互证。

“形象史学”这一概念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于 2011 年提出的。^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的前身是著名学者沈从文所在的中国服饰史研究组。服饰史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服饰史需要大量的图像和实物史料来论证与说明问题。沈从文身体力行的形象史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构建形象史学这一新型学科的直接源泉,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开始编辑发行中文集刊《形象史学》,面向海内外征稿。自 2021 年起《形象史学》每年出版 4 辑。《形象史学》常设栏目有理论探讨、名家笔谈、器物与图像、考古与文献等,主要登载专题研究文章,以及反映文化史研究前沿动态与热点问题的综述、书评、随笔,相关领域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形象史学理论与实践成果展示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指出,文化史研究具有特殊性,需要依靠大量的历史实物和图像相参证,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发掘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的趋势。正是在这

^① 刘中玉:《形象史学: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河北学刊》2014 年第 1 期,第 19 页。

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新的史学研究范畴。形象史学有两层含义：其一，就文化史研究本身来说，指运用传世的包括出土（水）的石刻、陶塑、壁画、雕砖、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以及文化史迹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传统文献整体考察历史的史学研究模式；其二，就文化史研究成果表述来说，采用大量的有形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表达研究者的思路与心得，读者也更容易接受。^①

形象史学作为新的文化史研究理论方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关注。学者围绕形象史学的具体学科范围、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发表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例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仲丹认为，“形象史学”与图像史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把实物归纳进去，它更强调超越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路径进行开拓。形象史学使研究从平面概念转向空间概念，更加注重实物研究；形象史学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更侧重从上层研究移到下层民众的研究。形象史学挖掘民众生活，比较注重实物中的文化内涵，重视人的生活方式，突破了以前正史中过于依赖文字的方式，又跟器形学方式中比较重视器物有所区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牛克诚研究员认为，就艺术史研究而言，“形象史学”打通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主体上精英与民间的界限，使那些民间、日常的东西成为与文人画一样的研究对象。这既使物质生活史的研究成为一种可能，也暗合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旨趣。形象史学带来的研究方式上的一个转换是由文字性转向视觉性。通过这样的转换，我们会看到，此前有很多不作为史料或不作为史实探究对象的东西进入史学研究视野。随着“形象”成为研究对象，“图”获得了与“画”一样的平等性。“形象”还可拓展为三维形式的立体物——“器”，如瓷器、家具、道具、工具等。画、图、器这些构成“形象”的素材，总体为“物”，与传统史学中作为史料的“文”相区别。形象史学的任务当然

^① 薛倩：《“形象史学”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A02版。

不会停留在对“物”的“观看”，而是进行具有史识的“阐释”。形象史学打开大门，将一切物都放了进来，在我们对于空前丰富的史料应接不暇的时候，传统史学“文”的基本素养决定着谁中的谁更能穿过物的表象而接近史实真相。^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形象史学》主编刘中玉围绕形象史学理论方法的产生过程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形象史学：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从“碎片化”到“形象化”——简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史观》（《形象史学研究》，2014）、《历史研究中形象材料的使用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从形象出发：试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路径》（《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6期）等。

关于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弓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角度直接给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张弓指出，形象史学既有同传统史学相通的一面，又有须适应形象（图像）之内涵意象化的特殊性的一面。一般来看，形象史学属于历史学之文化史范畴，历史学普遍遵行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科学实证方法同样适用于形象史学研究。一幅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绚烂画卷只有在对历史的文字表述与形象描述中才能得到呈现。特殊地看，形象史学研究缘于图像、文献资料交互为用，亦缘于图像（含实物）内涵的意象式特性，先贤盛倡的传世与出土文献两重实证法，在新的研究实践中发展为多样形式。运用专题形象序列内的多帧图像，对照排比研究，是为自证；运用历史文献记载，同历史图像（含实物）比较对照，互为证实，互为证伪，互为补充。不同形象序列之间，相关图像对应互证，互相发明。采集外域图像，同本土同类图像比较互证。中外对照，观其异同，查其渊源演变，借以揭示两者间的历史文化因缘及本土形象（含实物）独特的历

^① 薛倩：《“形象史学”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A02版。

史文化内涵，深化对本土形象内涵的参悟认知。同时还须注意，形象史学的某些图像（文物）资料往往蕴含史前文化意象或元典精神意象或某种高层次文化意象，难以直接运用图像加文献的方法索解、发覆。于是“心证”法在长期实践中酝酿而生。“心证”指学者本人对上述玄奥艰深意象自具的独到悟解与卓见。这种悟解与卓见不是无根之谈，它来自学者本人深厚的文化学养，尤其得益于中华元典精神的浸润，更来自学者对相关形象序列长期把玩、鉴赏、考察的个人实践。^①此外，张弓还指出，形象史学“这一崭新的学术主体与学术视角，与其说出自学者群体首倡，不如说近数十年来文物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繁荣为历史图像研究揭橥新生面。形象史学的萌生固然有它的合理性，形象史学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如要成长繁荣尚待筚路蓝缕的开拓”。^②

以上对形象史学理论方法的由来、特色等做了概述，从理论方法及实践来看，形象史学虽然是一批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智慧结晶，但显然不仅适用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适用于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虽然鲜见相关研究成果，但在日本学界以图证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学术积累。

三 “形象史学” 在日本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日本学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但援图入史、以图证史等实质运用形象史学方法的研究在日本学界早已有之，特别是在地理学与古地图学领域的研究积累已经相当深厚。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从部落问题研究所编《关于部落史的综合研究》第二卷（柳原书店，1961）收录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说日本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运用形象史学方法的研究。例如，运用日本东寺相关史料中的“大悲心院属地散所绘图”、贞治五年（1366）制成的“播磨国

① 张弓：《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2013），人民出版社，2014，第6~8页。

② 张弓：《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第3页。

小宅庄三职方绘图”、永享七年（1435）制成的“妙见寺插图”等文献的插图资料，对被称作“散所乞食法师”“河原者”的日本传统艺能文化传承者贱民展开的研究等。^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些日本社会史学者又开始尝试运用绘画资料研究传统艺能文化。日本中世文化史学者、曾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长的黑田日出男的论文《作为史料的绘卷物与中世身分制》（《历史评论》第 382 号），著作《境界的中世、象征的中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姿态与动作表情的中世史》（平凡社，1986）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是较具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因为绘画不同于写真照片，其描绘的内容难免有很多不是现实景致，而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构想，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史学界，对将绘画作为历史文献使用仍存在很多疑虑。黑田日出男在《姿态与动作表情的中世史》“终章”中称，其撰写该著作的目的就是建构日本历史中的“绘画史料论”或者说绘画史科学。既往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日本史研究中虽然有运用插图的研究，但尚未见使用绘画史料的研究，因此也缺乏可资借鉴的解析绘画史料的方法。为了避免走太多的弯路，就需要广泛阅读所有有助于建构“绘画史料论”的书籍，特别是要从美术史学古典以及符号论的诸多成果中充分汲取营养，但不可机械地运用和拼凑使用。不能仅仅把“绘画史料”的读解与分析视为对美术史的辅助，而是应该在将来把“绘画史料论”建构成与美术史学具有同等学术地位的存在。^②

“绘画史料论”与形象史学理论的学术追求可谓大同小异，因为形象史学理论建构也面临如何处理形象材料与文字材料、形象史学与艺术史学之间关系的问题。物质文化史与艺术史对于有形有象的历史材料的称呼，凸显了各自研究侧重点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前者一般将之称为“形象材料”，而后者则往往将之称为“图像材料”或“视觉材料”。在立足于具体实践对历史文献重新认识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

① 川嶋將生『室町文化論考—文化史のなかの公武—』、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188 頁。

② 黒田日出男『姿としぐさの中世史—絵図と絵巻の風景から—』、平凡社、1986、233-234 頁。

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所形成的形象史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史学研究方法论，从学术生产力的角度主张形象材料与文字材料应该为一种平等的关系，对其不应予以核心与辅助的界定，也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理解为互相解释、互为印证的关系。^① 形象史学与艺术史学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运用绘画史料研究传统艺能文化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川嶋将生的《中世京都文化的周缘》（思文阁出版，1992）、濑田胜哉《洛中洛外的群像》（平凡社，1994）、河田光夫的《中世被歧视民的装束》（明石书店，1995）、川嶋将生的《“洛中洛外”的社会史》（思文阁出版，1999）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通过对绘画史料的解析，特别是通过对描绘京都景致的“洛中洛外图”屏风等绘画史料的解析，聚焦日本中世被歧视民众的生活状态与衣着色彩等，立体生动地重构了中世被歧视民众的具体形象。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在探讨读解绘画史料的方法论方面有了更大的进展。法政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川嶋将生的《室町文化论考：文化史之中的公武》对日本学界以图证史的研究历程做了全面梳理。2009年，以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川嶋将生、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松本郁代、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出光佐千子等为代表的学术团队“风俗绘画研究会”提出了“风俗绘画的文化学”概念，这也是一种追求跨学科研究日本文化的理论方法。风俗画是以描绘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习惯、规范、装束等为主要内容的绘画。例如，描绘了京都四季都市景观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洛中洛外图”就是初期近世风俗画的代表作。风俗画已经不仅是美术作品，也是历史学、文学的重要文献。川嶋将生、松本郁代、出光佐千子等将这种以风俗绘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论，名之为“风俗绘画的文化学”。2009~2014年，他们还连续组织美术史、文学、历史专业领域学者对风俗绘

^① 刘中玉：《历史研究中形象材料的使用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第49~51页。

画展开跨学科研究，以期动态立体地还原与重构风俗绘画所描绘的其所处时代的生活风景，并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相继出版了《风俗绘画的文化学》（思文阁出版，2009）、《风俗绘画的文化学Ⅱ》（思文阁出版，2012）、《风俗绘画的文化学Ⅲ》（思文阁出版，2014）。这三部著作通过对日本中世至近世风俗绘画的诞生背景、绘画主题与表现手法及以此为媒介交织的制作者、鉴赏者等人际脉络等的解析，对风俗绘画的时空特性、潜在功能与社会影响进行了全面而精彩的跨学科重构。从这三部厚重的研究著作内容来看，“风俗绘画的文化学”方法还是以“象”——风俗画为主要研究材料，对于“形”的方面关注不多，这也是其与形象史学理论方法的最大区别。

结 语

从以图证史、“绘画史料论”、“风俗绘画的文化学”，到形象史学，可谓中日两国文化史学者不约而同的方法论探索。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外学界就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跨学科研究并非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简单嫁接拼合，而是观念的融会和思维的创新，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背景条件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叙述结构。在反思既成单一学科研究滞后，探索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当下，形象史学研究方法可谓应运而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期待在未来的日本文化研究中，形象史学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还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即通过形象化地呈现日本文明发展演进的丰富性与多彩性，立体地还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风景，为推动中日间新时代文化认同的重构探索一条可能的路径。

（审校：王一晨）

Keywords: East Asian Perspective; Japan; Geino Culture; Discriminated Mass; Comparative Study

Psychoculturological Approach to Japanese Studies

Shang Huipeng / 12

Abstract: Psychoculturology provides a model to grasp people as a whole with the two core concepts of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and “Human Constant” (“jen” in Chinese), The conceptual tools of Psychoculturology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experience of “people” (jen)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cholars in the two countries. It takes the Japanese as a subtype of “people” in the overall model—the “Yuan-jen”,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Human Constant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group, exchange, emotional control and self-cognition. The psychoculturological approach to “Japanism” (nihonrasisa) is not out of date today, as it provides a persuasive explanation for how Japan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particular problems that aros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Japanese society.

Keywords: Psychoculturology; Japanese Studies; Human Constant; The Contextual; The “Yuan-jen”

The Application of Picture Historiography in the Study of Japanese Culture

Zhang Jianli / 24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cultural studies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the Japanese ethnic group is often changed due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national strength. The three intensive discussions on Japanese 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late 1980s, late 1990s and late 2020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udy of Japanese culture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Methods such as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have been proposed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needs to be detailed. Objects and images left over from history are not only the for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but also an aspect of historical generation and exhibition. With the further study of cultural history, it has become a new tren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value of objects and images themselves. From the "Historical theory of painting" and "Culturology of custom painting" proposed by Japanese scholars to the theory of picture historiography based o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a theoretical metho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comes into being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Japanese culture.

Keywords: Japanese Cultural; Historical Theory of Painting; Culturology of Custom Painting; Picture Historiograph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 **Historical Research** •

Taoism and Ancient Japanese Politics

Cai Fenglin / 39

Abstract: Taoism is an indigenous Chinese religion with the highest belief in ultimate pursuit of immortality. Elements of Taoism were introduced to Japan before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 earliest introduction of